

夏志清的夹钟为谁而鸣

顾彬为什么这样红

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终极身体写作

从舒婷看诗歌的崇与耻

王朔为什么令人失望

王蒙的老年写作问题

文学奖：女人的化妆品

吴平研讨金和红色的实话实说

两生花：丁玲与波伏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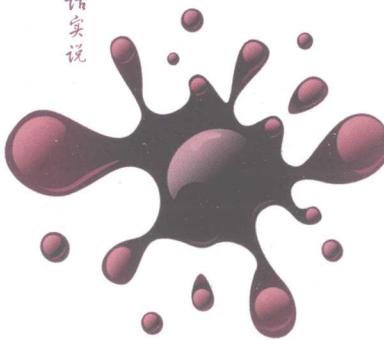
关于南京，我们还能说点什么

女性——爱情——男作家

文坛伯乐今尚在

李美皆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

李美皆 著

凤凰
江苏出版
文艺传媒
出版社
集团

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 / 李美皆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399-3396-2

I . 为… II . 李… III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599 号

书 名 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
著 者 李美皆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9.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396-2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辑

王蒙的老年写作问题	3
从舒婷看诗歌的荣与耻	17
夏志清的丧钟为谁而鸣	32
王朔的孤独转身	45
王朔为什么令人失望	52
女性—爱情—男作家	60
关于研讨会和红包的实话实说	68
当“非 80 后”遭遇“80 后”	80
顾彬为什么这样红	93
文学奖：女人的化妆品？	100
评论家的小话题	112

■ 第二辑

两生花：丁玲与波伏瓦	125
法国出了个波伏瓦	134
王夫人之三角关系与辣手摧花	142
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	153

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	178
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终极身体写作	191

第三辑

解构：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	203
乘上周渔的火车	213
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222

第四辑

关于南京，我们还能说点什么？	233
当下军旅文学创作的冷热得失	242
被修辞化的历史细节	248
重读《人生》	256
短评四篇	274
拥抱一个庄严的誓言	
——序陈歆耕《废墟上的觉醒》	282
在鲁迅故里读鲁迅	289
实事求是 诚信批评	294

第一辑



王蒙的老年写作问题

曾经非常崇拜王蒙，那是在看《青春万岁》的时候，那是在读《高原的风》的时候，里面有些段落我都可以背诵：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人生是痛苦的。当生活是痛苦的时候，我们为了生活而痛苦。当生活不再痛苦的时候，我们为了自身而痛苦，亲爱的妻！

王蒙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老作家。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王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如同每人仅此一次的青春。王蒙对于这代人的意义，也许就如同苏联文学对于他那代人的意义。对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王蒙也有着独特的意义。我接受王蒙的影响就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候《青春万岁》被拍成电影，《人民文学》上经常发表他的小说，那时候他是激活文坛的一根神经。王蒙自己曾经说，《青春万岁》写得最青春。是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青春，那种早晨一般的笑容，那种冒着热气的青春，再也无从寻觅了。而《高原的风》中那种点燃内心的力量，至今还令人激荡。相信时间越久，你会越发愿意去回味它们，去感受那远去的热情以及被称为“少布”的赤

诚——只要你曾经是王蒙的读者。我庆幸在青春期读过王蒙，无疑，他使我的青春更像青春。

再读王蒙就是《坚硬的稀粥》了，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感觉完全是两个味道，甚至可以说两个人了。王蒙自己说，《坚硬的稀粥》写得最讽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这份“坚硬的稀粥”变得如此难以消化。

写《青春万岁》时，王蒙正处于青年期；写《高原的风》时，他虽然已经处于中年，但面对新生活的那股激情还是使他显露出某种青春气象；而写《坚硬的稀粥》时，他已经开始步入后中年或前老年了，至少在心态上是如此。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已然成功的老作家如何面对渐趋老年的写作？王蒙在他的自述中毫不掩饰自己的老年况味，这也使我们可以坦然地探讨这个问题了。

王蒙老年写作的“太聪明”问题

不见得王蒙老年的创作就不如早年，但他的作品已经没有了打动人心的那种力量和情愫，却是不争的事实。是的，王蒙的确越来越圆熟了，不过同时也在显示出某种“熟过了”的症候。虽说人情练达即文章，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圆熟却并不总是意味着一种上升。这些年对于王蒙的争议，也大多集中在他的老年写作上。这些争议集中起来就是三点：太聪明、世俗化、缺少质疑精神。

世俗化与他的年纪有关，也与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有关。王蒙所谓的世俗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于世俗的肯定，以及对于世俗精神的倡导，而是一种包容和中庸。这种包容和中庸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保守。德国有句谚语：“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这几乎是一种人生的必然，如同激荡的小溪最终必将汇入平稳的河床。其次，这种包容和中庸还体现了经历过苦难的

人对于人生的一种善意和体恤。王蒙这一代人都是经历过磨难的人，从人整人的时代过来的人，深深地感受到人生之不易的人，那么，苦尽甘来感慨万端之余便很容易一转而希望从此天下太平，人人都来享受生活，感恩惜福知足宽容，不要再争争斗斗的了。这种从感喟中生出来的宽容可以理解，但并非完全值得肯定，不可能因为社会形势好转了，便从此没有是非之争了，高低都无所谓了，一切都无可无可了。是非高下之别永远是有的，有时也许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串葡萄和一粒葡萄的味道是一样的，但吃一串葡萄和吃一粒葡萄的感觉却是不一样的。王蒙的“非争”与他所经历的时代有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太多的斗争已经使他排斥一切形式的斗争了。这种“厌屋及乌”固然是过了，但它起码比一个深受过“文化大革命”斗争之苦的人依然坚持自己的斗争思维要好得多。

王蒙的“太聪明”和“缺少质疑精神”我认为是一回事，所以把二者放到一起来谈。聪明是永远不为过的，人类向理想王国迈进的过程就是一个使自己无限聪明起来的过程。文学具有认识功能，认识功能的大小取决于作品对于生活的揭示程度，作品对于生活的揭示程度又取决于作家对于生活的洞见程度，所以作家对于生活看得再透也不为过。

质疑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有疑惑。可是对于王蒙这样一个具有非凡人生经历的人，疑惑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王蒙14岁入党，18岁任北京团区委副书记，20岁写出《青春万岁》，22岁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然后被划为右派，发配伊犁，一去十数载，新时期又重返文坛，并官至文化部长。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共和国的历史。曾经沧海难为水，一个尝遍人生百味的老人，疑惑的底线必然非常之高了，基于阅历的高度智慧已经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不惑之人，世事洞明已经使他获得了一种历史老人一样具有穿透力的目光，那么，他还能质疑什么呢？如果硬要他在水平线以下发生什么疑惑，那就是装傻或装不懂了，远不如让他

处于自己的水平线以上更可爱。

当我看到王蒙被指“太聪明”的时候就禁不住困惑，是说他人大太聪明还是文太聪明呢？也许有人以为这是一回事，事实上并非如此。王蒙其人的确是聪明，他的早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这聪明过多地、直接地、囫囵吞枣地带到写作中来，却恰恰变成一种不聪明。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聪明必然是大智若愚。他明明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但在写作的过程中还必须装作不知道；他明知道某一人物是一个傻子，但他还得学着傻子说话，学得不像都是失败。说到底，作品中所有的话其实都是作家的话，但当他去经营一个人物时，还必须假装那话不是自己的，而是人物的，越不像出自作家之口的越好，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于这个矛盾的解决，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能力。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作家的水准，就取决于他解决写作固有的那种矛盾的能力。聪明的作家必须把握好这一点：作品需要他去充当一个什么人物的时候他就要去充当一个什么人物，而不能总是一个智者。作家在写作中必须大智若愚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通过大智若愚把自己化入或沉潜下去，那聪明就是浮在表面的、浮泛的，就像炒菜，油用得不少，但是都浮在表面，滋味没进去。这样的为文就不能算聪明了。只有能够被自己的文本充分消化掉的聪明，才是真正属于为文上的聪明。

无论多么聪明的人，进入写作之中还是应该大智若愚。拿小说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小说总是给人一种太聪明的感觉，那恰恰说明他不够聪明，缺乏小说家的智慧，小说的功夫没做好。所以我认为王蒙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聪明或者缺乏质疑精神上，而是出在写作技术上，是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作家无论有多么高远的立意和宏大的构思，具体到写作当中，还是要体现在一个个起承转合以及细枝末节的微妙处理上，还是要小心翼翼。就像漂流，再怎么豪情万丈气吞山河，最终的成功还是要取

决于能否绕过那些大大小小的暗礁。小说家的功夫有时就见于这些不起眼的地方。

所以，小说家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容易导致越俎代庖，直接代替人物来说话。作家的话必须变成人物的话，如若不然，就没有人物而只有作家了。使作家成为作家的是他笔下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光秃秃的作家。王蒙的老年写作就存在着用自己的话去代替人物的话，用高于人物视角的议论去代替具体描述的弊端，有时候甚至会形成对于人物的强行干预，甚至干扰。作为一个风云看遍的老作家，王蒙当然有资格发议论。但是，发议论不是写小说，真知灼见不能代替形象塑造。读者要看的是小说，而不是直接的真理。真理是赤裸裸的，但小说必须是一个穿戴整齐音貌宛然全须全尾的形象系列。马克思创造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主义，但他却不是小说家。作家要让人物去汪洋恣肆，自己却不能汪洋恣肆，也不能代替人物去汪洋恣肆。适当留白才能让读者会心一笑，才能给读者发现和悟道的快乐。如果作家把什么都说出来，读者的快乐就被剥夺了。

作家的感悟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进入到写作当中，还是要把这种感悟还原成生活，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真实的生活，后者是表现的生活。这就如同金子和金沙的关系。就算作家手里有金子，也不能直接把它捧给读者，读者要的是金沙，以便自己从中提炼金子，阅读的快感就在于这种提炼。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必须跟形象有机结合，要感性具体，有血有肉，比如，《红楼梦》表达了一个好、了、空、无的人生顿悟，但曹雪芹不能光说一个“好就是了”“色即是空”便完了，他还得不惜工笔去刻画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形象，不厌其烦去描述他们的生活细事。文艺是一种形象审美，这就是人们不直接去看社会生活的原因，也许有时候我们觉得生活中的内容更有价值，可是，如果它不能以形象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没有被欣赏的可能。所以，真理或感悟怎样艺术地去呈现是

一个问题，如果给它一件故事的外衣，再给这件外衣绣上美丽的花纹，它可能就很有魅力。相反，如果只是抛出一块原生态的布，并对这布指点和议论一番，就毫无艺术魅力可言，不管这指点和议论有多精辟。

上帝给人以智慧，是要人慎用它，而不是挥霍它。不能用人生智慧来代替小说智慧，否则就把小说之为小说的那种东西废了，把小说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王蒙的问题不是太聪明，而是小说家意识的退化，小说功能的丧失。他的问题不是知道得太清楚，而是说得太清楚、太直白。无疑，王蒙是一个很有道行的智者，具备相当高的人生智慧，但是，这些智慧运用于他的创作却差不多只是注入了内容部分，而很少到达形式部分，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智慧找到一个合适的表现方式。他的创作功力貌似圆熟，实际在退化。这个退化是相对于他感悟力的上升而言的不进则退。我们通常认为一个老作家就不存在技术问题了，作家自己也可能这样认为，实际上不是的。王蒙需要高超的技术来驾驭他的内容，技术的更新跟不上，不能适应新的表达高度的需要，就会导致以文害意。

得天独厚的条件和阅历，从文和从政的双重体验，使王蒙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取代的“这一个”，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功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龄的老作家差不多都已经不写了，只有他还在热情洋溢地写着，不仅写着，而且为年轻人所议论着，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有人批评是一件好事，西方有一句谚语，谁会去踢一只死狗呢？这个年纪的人所写的东西，多是一生的总结与回忆，类似朝花夕拾，但他不单是个人的总结和回忆，更是社会的、历史的总结和回忆。他把小的人生和大的人生结合起来，把个人境遇与历史境遇对接起来，把自己放在整个社会历史中来考察，使历史成为个体的镜子，鉴出个体在历史的影子底下如何活着，这一点是很多作家不能企及的。因此，王蒙具有独特的文学史

价值。

王蒙已经步入老年，从理论上来说，老年的写作应该是更为深厚和沉潜的，但事实上，人一旦意识到老之将至，就容易产生来不及了的惶恐和紧迫感，就会不顾一切地往前赶，争取赶在大脑退化之前把想写的东西都写出来，有多少算多少，不留任何遗憾。这恰恰造成了另一种遗憾。因为赶，就难免不从容。信息储存大，内心却不从容，写作中就容易发生瓶颈效应，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那么邃密、耐读。

智慧必须经过沉淀，才能散发出美感。感悟必须经过锤炼，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生活必须经历过滤，才能显出细腻与精粹。如果小说是海洋的话，小说家应该是沉浸在海洋中的一个水手，而不是海面上的一个浮标。如何让自己沉下去，是王蒙老年写作的一个问题。首先要放慢速度，他写得太快了，一泻千里，根本来不及反刍。写一部算一部，带走该带走的，留下该留下的，一派坦然，这样就可以了。

王蒙老年写作的语言问题

王蒙的语言很有特点，繁复叠错，密密匝匝，排山倒海，汪洋恣肆，就像玩杂耍一样，令人眼花缭乱。随便举一个例子：“愈说愈热烈愈说愈拥护愈说愈兴奋愈说愈打心眼儿里痛快得没得说啦您哪！”互相咬着的链条一般的句式，连贯，一气到底，有说书人的劲头。他好像越来越不喜欢简洁。这样的语言特点已经引起批评者的注意，称道者认为他的语言土洋结合，文白结合，正反结合，体现了非凡的功力，不以为然者则认为体现了一种话语的失控状态。

我不赞赏王蒙的语言，但我也不认为它是一种失控，我认为是一种放纵。放纵，也就是不羁或无忌。王蒙这种不羁的唠叨其实就是因为他太游刃有余居高临下，放得太开了。这么大岁数了，还

那么收干吗？何不说个痛快——于是就释放到了这种松弛甚至松懈的地步。失去张力的语言，就会沦于鄙陋并丧失美感。作家运用语言的时候，还是应该提着一点，不能太放。过犹不及，就像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如果太放，丹田之气便守不住了。

王蒙的语言节奏很快，好像要急着把所有想得起来的好词都用完，把所有想得起来的好句子都说完。欲一吐为快，便放弃了语言的精粹性，而只剩下语言的撒欢甚至撒野，导致一个泥沙俱下的结果。作家运用语言的功力应该体现在以最少的词汇传达最多的内涵上，而不是以最多的词汇传达最少的内涵上，简单说，就是以少胜多，而不是以多胜少。图一时痛快便会使语言冗赘如同囊肿，使作品的机体显得泡泡的。

语言当然可以不拘一格，不能期望千篇一律的正经格调，但是，语言的“不正经”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把文字当作杂耍来玩，就会使读者失去对于语言文字的敬意，以及对于语言文字的内涵的敬意；就会使语言文字失去尊严，写作失去尊严，甚至使作家失去尊严。即便不追求文字的崇高感，也不能沦为语言的杂耍。语言的杂耍与一个大家的风范是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的危险就在于作家的文字一旦失去读者的信任，它的价值意义就很难实现，发人深省的可能也变得稀松平常了。如果一部作品的语言似乎在告诉读者你不用正经看我的小说，但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却又恰恰是必须给人正经看的，那么这个作家的创作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意义的自我消解。所以，语言的品位还是必须要讲究的。

王蒙在解读《红楼梦》的时候曾经说过，语言是表达最重要的方式，有时又是表达的坟墓，语言背后的味才是最重要的。王蒙的语言就失在这个“味”上。语言应该尽量保持自己的余味，如同幽默里面也应该有留白，那留白正好放得下读者的会心一笑，如果已经填得满满的，读者还上哪会心一笑去？语言的落拓不羁可以，但不可以过度，形成某种惯性就更不可取了。这也许就是王蒙的调

侃被人认为生硬、不自然的原因。

如果一味任语言去燃烧，就会充溢着破坏和毁灭的力量。王蒙的语言狂欢与文学的审美精神是相左的。语言的盛宴必须摆在思想的客厅里，审美的桌布上，否则就显得泛滥和大而无当。

当然，王蒙的语言有自己的锐气，这种锐气来自一个老人的生命活力，体现着一个老人生命的活跃程度，是非常难得的。正是这股锐气，使许多批评者在面对王蒙的时候忘记了他是一个老人。不过，只要把他归入老人或者老作家的行列中去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他还在写作”——这本身就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放低一点，不妨把王蒙的写作看成为了防止老年痴呆所导致的失忆失语而进行的思维和话语操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照的话，对他也许就夫复何求了。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他毕竟还是王蒙。

王蒙老年写作的心态问题

王蒙的创作心态在《青狐》当中体现得最明显。《青狐》在宣传策略上打的是“性”这张牌，但我认为它其实并不是写性，而是性的反讽。反讽这个词，已经触及问题的核心。《青狐》不仅是性的反讽，而且是政治的反讽，文学的反讽。王蒙在《青狐》当中体现出来的心态，就是一个智者的反讽心态。

反讽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有时候可以让作品达到从正面去写不能达到的深刻，起到从正面去写不能起到的作用。但是，如果把反讽作为一种基本心态贯穿到创作当中去，就会显示出它的弊端：你把什么都反讽了，不反讽的东西在哪里呢？肯定的东西在哪里呢？自己在哪里呢？“人生总要有所珍视和眷恋”，这是王蒙自己的话。是的，如果痛苦也可以被反讽，崇高也可以被反讽，抒情诗就变成打油诗，崇高和低下就沦为同一样的东西了，最后的结果就

是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美的也是丑的，丑的当然更丑，写作的意义就被消解了。这也许就是躲避崇高和消解崇高的结果。但是，崇高和可鄙之间无论如何是不能画等号的。

应该说，王蒙对青狐这个人物还是有所肯定的，他自己在专访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青狐》写得非常像一个小说，因为它有一个很奇特的、有魅力的人物。青狐有才华、有热情、有个性，有时候又犯傻，她在历史的转折当中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就被一下子推到一个角色一个位子上面去了，她坐在这个位子上会出现尴尬，也会出现才华洋溢、得意洋洋和失望、困惑。她有强烈的个性，也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别人不敢说的话她敢说，可是从总体来说，她又不肯脱离开这个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规范。《青狐》里面又有一些和时代历史无关的，可以说是人生的，尤其是女性的遗憾和不平。他自己一边在对这个人物进行某种程度的剖析，另一边又不断地在困惑：对人生感到困惑，对情感感到困惑，对一些社会关系感到困惑。^①

王蒙在此用到了“困惑”这个词，也许这是他本来的想法，可是当我们真的去看《青狐》时，发现里面没什么困惑，作者完全像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以一种俯瞰芸芸众生的高度和深刻的玩世不恭议论着一切又消解着一切。王蒙在《青狐》当中运用了大量的幽默调侃以及挖苦、漫画式的表演手段，有时甚至直接是戏说。王蒙对于青狐这个人物缺少肯定性的发现，而更多的是站在社会政治的高度进行无情的反讽和嘲弄，甚至恶作剧般地醉心于暴露她的不堪，使一个原本有其可敬可悲的女性形象，变成了一个蹩脚而可怜的小丑，以至于连她的可爱也是来自可笑，令人褒贬莫名、哭笑不得。如此一来，人物的人格魅

^① 上海东方电视台 2004 年 6 月 27 日《可凡倾听——王蒙专访》，见华人英才网：<http://www.cheagle.com/fArticleView.exml?ArticleID=1215>